

传承桂林抗战文化资源 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汤志华 陈红惠

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战时期,桂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条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指导,吸引了各地的进步文化名人汇聚桂林,创办了大量的文化机构,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当时,先后在桂林创刊、复刊的报纸杂志有200多种,开设的书店、书局、出版社有200余家,出版的书籍上千种,各类文化演出团体也有60余家,桂林由此成为了当时享誉全国且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抗战文化中心。

一、桂林的丰富抗战文化资源及其重要价值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桂林目前尚留有的抗战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抗战领导机关遗址(中共南方局和“八办”)、军事战场遗址、烈士或名人纪念碑、日军侵略罪证遗址、抗战团体机构旧址、社会名人和文化名人住址、抗战史料的宣传品和出版物等七大类,遗存整体呈现出类别丰富、内容翔实、数量庞大、价值充盈的特点。这些历史遗存是全国抗战文化历史和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彰显了桂林在中华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上所作的重要历史贡献,而且凝聚成为今天桂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物态基础。桂林抗战文化资源所彰显的爱国主义文化、科学民主文化、艰苦奋斗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民性、政治性、抗争性,其纪念意义和教育价值显著,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其一,桂林抗战文化资源集中体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民性。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正义战争,爱国主义是桂林抗战文化的灵魂和主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下,处在抗战大后方的桂林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爱国情怀令人震撼。当时身处桂林的文化名家创作出大量反映抗战、热爱祖国的文艺作品,举办了众多声势浩大的救亡活动,为抗战必胜讴歌,为民族复兴呐喊。爱国主义旗帜下强大的人民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在新时代条件下仍然熠熠生辉,能够把“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精神嵌入人民心灵深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其二,桂林抗战文化资源充分彰显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科学民主文化,具有坚定的政治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桂林抗战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抗战前途、两种中国命运的斗争贯穿文化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在周恩来、李克农、郭沫若等领导推动下,《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游击战、持久战等理论在包括桂林在内的抗战大后方的广泛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不仅正确指引了当时的抗战运动,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70多年的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先进文化发挥着磅礴伟力。“马克思主义行”的信

仰信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夯实着新时代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

其三,桂林抗战文化资源本身内蕴的中国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艰苦奋斗文化,具有突出的斗争性。抗战时期的桂林属于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文化独裁,使得发展进步文化事业面临着极为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当时会聚桂林的15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名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即使身处逆境,依然发挥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努力创作出反映时代要求、人民需要的抗战文化作品,为民族独立解放鼓与呼、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正义事业鼓与呼,前赴后继,不断奋斗,直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这种不懈奋斗的斗争精神对于新时代教育、激励和增强广大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使命担当具有重要价值。

其四,桂林抗战文化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性特征。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桂林抗战遗存中的美国飞虎队遗址和纪念馆充分反映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性影响。桂林的抗战文化是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深入挖掘其中的历史与时代价值,对于新时代加

强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国际交流,进一步扩大抗战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努力打造成为国际旅游胜地和世界级旅游城市具有重大意义。

二、文旅融合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其一,以“桂林抗战文化+”的形式推动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目前,桂林抗战文化遗产中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24处。在加强现有遗存文博场馆建设和发展的同时,要继续整理挖掘桂林的各类红色足迹和非物质红色遗存,并通过桂林抗战文化+自然山水风光、桂林抗战文化+少数民族风情、桂林抗战文化+文创产业发展等方式,促使红色遗存“碎片化”散落向“串珠成链”效果转变,从而不断推动桂林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

其二,聚焦特色文化品牌打造,提升桂林红色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文化抗战在桂林抗战历史中尤为突出,影响深远。因此,要充分挖掘桂林文化抗战的红色资源和历史传承,激活其中内蕴的“文艺基因”和“历史记忆”,紧扣桂林抗战文化和西南剧展等重大历史主题,有效激发“桂林抗战文化名城”的独特影响力、吸引力和引领力。通过打造桂林艺术节等文旅平台,回应广大人民对高质量文化产品和精神需求的时代需要,着力推动桂林大中小学开设好抗战文化校本课程,让广大学子全面了解桂林抗战文化这段历史、认同桂林抗战文

化中蕴含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擦亮以“文化抗战”为核心的桂林特色文化旅游名片。

其三,突出国际合作,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秉持桂林抗战文化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国际化发展理念,在“国际日”“漓江日”等重要国际文旅节庆中主动融入桂林抗战文化的主要宣传,积极推动文旅融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扩大桂林历史文化名城和抗战文化名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契机,主动对接国际旅游市场,加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抗战国际化研究,用中国话语为世界友人讲好、讲深桂林抗战故事。

总之,做好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需要关注融合化、品牌化和国际化的提升,要让桂林红色抗战文化资源“活起来”,让桂林抗战文化品牌“亮起来”、让桂林文化旅游“强起来”和“走出去”,进而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作者汤志华系广西八桂学者,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惠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研究”(22VRC093);广西八桂学者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厅发2019(79)号)的阶段性成果。】

书评

感受学术的魅力 追寻文化的脚步

——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新论》

□王永贵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范畴、术语范畴、逻辑范畴、运思范畴和实践范畴,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观点:文化的寄形方式表现为从个体心理到集体思维的汇聚结果,文化的赋能形式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及成果,文化的映射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意识流变及其表达,文化的符号表达是思维活动的意义归纳及其实践结晶。该书认为,文化意义赋型中的审读方式,文化品质养成中的价值蕴蓄,文化思维方式中的辩证特征,共同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和系统。文化在固结方式、渐变形式、基本性质和结构层面呈现的品质和特征,包含着文化哲学的问题范式、因果范式、对象范式,以及文化的一般构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构象。在一般形态上,它是一种覆盖生活的现实、囊括科学的现实、摆脱僵化统一原则的现实。文化符号与话语的逻辑关联中,“建构”与“解构”是常见的方式,其意义链接和内容承载源于现实社会的需要。在特殊形式上,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符号变迁有其规律和动力,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建设文化的认识和符号建

构,是在独特的思路和逻辑中体现的,是个性与共性、继承和创新、长远和未来的辩证统一。

三是明晰的边界意识。作者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见地。边界意识是对文化哲学思维的“有墙”与“无墙”的一种选择,对文化边界的学理阐释、存在形式、现实走势的认识,能体现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守护,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重要表现。技术的边界、价值的边界、语言的边界等,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守护有密切关系。当今社会中,不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侵蚀,是很严重的,这对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守护精神家园提出了严峻挑战。该书提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坚守初心和使命是坚守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常态化的学习机制,提升坚守初心与使命的理论修养;构建常态化的运行机制,明确坚守初心和使命的实践路径;构建常态化的养成机制,夯实守护初心与使命的主体

基础;构建常态化的管理机制,优化初心与使命的表达方式。

四是强烈的实践意识。提出求真务实、立足当代的求实律,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求同律,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求是律,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求通律,为我所用、体现特色的求新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方面,提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律,“双百”“双创”“二为”的互补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的革新律。作者认为,文化动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软实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力,是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包含着通过文化动力走向社会规范的思路和理论路。作者认为,文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重要内容,其作用状况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果。市场监管规律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基本遵循,资源利用规律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内容支撑,文化产业对文化资本的运动是在独特的规

律中运行的,文化市场本身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文化产业要凸显自己的经济和价值属性,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价值养成规律的基本品格是与“时”俱进、与“势”俱进、与“史”俱进、与“实”俱进、与“事”俱进。作者指出,要在“两个结合”中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动”与“静”、“变”与“不变”的关系,把握中华传统文化“新”与“旧”、“古”与“今”的关系,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要在坚持文化自信中把握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增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

总体上看,尽管该著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可以归纳出四个方面的创新,即:研究视角创新,以创新思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体系,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哲学研究的格式和方式;研究方法创新,是用“接着讲”“创新地讲”的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结构体系;研究内容创新,既致力于探索源头和脉络,又着眼于应用和实践;理论观点创新,以全新的视角描绘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的生成轨迹及其总体环境、总体目标、总体结构和总体特征,揭示其嬗变之源、嬗变之形、嬗变之理、嬗变之力。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为整理底本,除了准确标点,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勘,比对不同刻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和内容详略,出具校记,订正底本所存在的文字讹误。另外,整理者还根据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对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加标专名线,大大方便了阅读。

三、编排科学合理

《顾宪成全集》分上中下三册。首为《整理说明》,全面梳理了顾氏的生平、著述,考察了其著述的存世情况,并对全书的编校体例作了说明。次为顾宪成本人著述。在顾宪成本人著述中,学术著作居前,学术性不是很明显的著作置后,以彰显顾氏思想家的身份。然后是整理者辑录的顾宪成的乡试答卷和制义。顾氏本人著述后,最后是顾宪成后人编纂的《顾端文公年谱》和附录四卷。这样的编排,既清晰合理,又能凸显顾宪成理学家的身份和整理者的辑佚之功。

顾宪成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迄今学界对他的关注仍远远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学者对其著述进行系统整理,缺少系统完备的文献支撑。《顾宪成全集》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相信必将推进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学派相关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现明代东林学派的思想光彩

——评东林学派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顾宪成全集》

□尹楚兵

层出不穷。由于国力衰弱、武备松弛,崛起于关外的女真族也开始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内忧外患、国是日非的形势,顾宪成主张用仁贤、广开言路,希望神宗能励精图治。在东林书院讲学之余,往往议政朝政,裁量人物,要求整顿吏治,革除朝野积弊,在当时形成很大影响。思想领域,当时王学盛行,王学末流更是从狂禅走向空疏虚无。顾宪成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著书立说,大力批驳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和王学末流之弊,主张经世致用,开启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顾宪成这样一位在明代政治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名人,其存世文献却一直未得到系统全面的整理。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青年学者,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学伟副教授关注到了学界的这个空白和缺憾,从搜集顾氏存世刻本,到文献的研读和

校勘,前后历经五年,终于在2022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煌煌三巨册120万字的《顾宪成全集》,使得东林学派领军人物顾宪成的思想光彩,穿越400多年的历史,得以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学伟老师编校整理的《顾宪成全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林学派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并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笔者在研读之余,认为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文献搜辑完备

文献整理的首要工作,是尽可能将存世文献一网打尽。《顾宪成全集》问世之前,搜集顾宪成著述数量最多的是清人编刻的《顾端文公遗书》,除顾氏后人所编顾宪成年谱不计外,其中康熙刊本《顾端文公遗书》收录顾氏著述12种,光绪重刻本《顾端文公遗书》目录著录顾氏著述25种(实为24种),《容齋言》标注“是书与《以俟录》并入《泾

皋藏稿》”,其中10种标明“嗣刻”,实际仅刊刻14种。《顾宪成全集》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了顾宪成著述的存世情况,遍访广蒐,搜集存世著述25种,并辑录其乡试答卷和制义52篇,堪称迄今为止收录最为完备的顾氏全集。

除顾宪成本人著述外,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顾氏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书末又附附录四卷。附录一为顾宪成后人,崇祯朝,其子顾与沐与朝臣请求褒恤、厚拟谥荫并呈进顾宪成生前书籍的上疏、参语,以及礼部的赐谥揭帖和马世奇所撰特恩录题词;附录二为顾宪成的传记及著述的题词、序跋、提要;附录三为《明儒学案·东林学案》顾宪成部分;附录四为《泾皋藏源录》八卷。《泾皋藏源录》汇集顾宪成师友门人学术交流的相关资料,是考察顾氏学术师承源流的重要参考文献,系首次整理出版。

二、点校精审细致

对顾氏存世著述,整理者精心遴选善本作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研究》

□钟瑞添

化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深厚理论根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相关论述,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该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境遇。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也面临着以下挑战:境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仍然艰巨。该书的第三部分说明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群众,不断增强马克思

主义理论自信;在全社会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共同理想;不断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在明确目标任务的前提下,该书的第四部分阐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遵循,一是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关注人民利益诉求,促进人们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换,用符合人民群众特点的简单而质朴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清楚、说明白,从而使人更好地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三是坚持联系实际,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对象的特征,找准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点和他们利益的交汇点,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还要通过坚持改进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该书的第五部分探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的方式方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包括帮助人民大众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促进他们在情感上

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及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身实践等诸多环节,所以可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概括为:理论教育与价值引导相统一;正面宣传与澄清谬误相统一;示范引领与自觉实践相统一。该书的第六部分阐明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抓手。专著指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着眼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梳理和总结新时代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领域。概括而言,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抓手有:切实加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重要精神支撑;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夯实群众基础。该书的第七部分是研究的落脚点,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策略。这部分说明广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队伍不仅要从

理论层面了解推进工作的目标、内容、重点,而且要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不断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落小、落细、落实。新时代新征程上,掌握科学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坚持为人民担当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遵循传播规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研究》一书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系统探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一定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系广西八桂学者,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